

主题栏目：汉语史与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字研究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14.03.112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李无未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清末, 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 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 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 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 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 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 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 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 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 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 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关键词] 《汉文典》; 清末; 文言语法; 谱系; 类型; 东亚汉语史; 特征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 The Pedigre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in China and Japan in Late Qing Dynasty

Li Wu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confirming the pedigre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Han Wen Dian)*, a ser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and Japan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thesis is focused on four aspects: the theories in the user's guide or preface,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compila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the functional system, which are the basic criteria of judging and confirming the pedigree. An explicit lineage exist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which can be embodied into three types: (1) Explaining Chinese functional words within a western grammar system, such as *Oka's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Oka-shi no Shina Bunten)* by Oka Sankei,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A Secondary Textbook* by Ueda Minoru and *Intermediate Chinese Grammar (Zhongdeng Guo Wen Dian)* by Zhang Shizha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books is that the explanations of words refer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Chinese scholars, for instance, quotations are taken from *Usage of Function Words (Xuzi Yongfa)*, a book written by Tang Biaoyi, in *Yongzi Mingbian*, a chapter in Oka's monograph,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收稿日期] 2014-03-1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4-09-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78)

[作者简介] 李无未,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及中外汉语学史研究。

derived from western grammar, like *Analytical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ibunten*) by Neo. (2) A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logy and grammar, such as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by Igari Konosuke and *A Diagrammatic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Hyoukai*) published by Rokumeikan. These books, with grammar as the main subject investigated, are interspersed with paleography, phonology and exegesis study, showing the tendency of a promotion from philology to modern linguistics. (3) Combining grammar with writing theory, such as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by Kojima Kenkichirou and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by Lai Yuxun. These books are written in a synthesis of writing theories like words using, sentence making and paragraph organizing with grammar as the main line. The originality of Lai's monograph lies in Chapter 4: "Literary Theory (Wen Lun)," which involves the "theory,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correction," making it move away from Kojima's rhetoric study in the linguistic category 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technique. By confirming the pedigree of these books,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can be effectively clarified, the academ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can be highlight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ation and creation of its academic system can be understo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pedigree has an orthodox position in grammatical teaching methods of classical Chinese. Whereas due to the asymmetry in institu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Japanese system shows more maturity. The vita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lies in its continuity. Most of the subsequent classical grammar monographs has a close theoretical relation with it. Studies on the pedigree will help us find the interlaced and separative symbolic traits in Orient Chinese.

Key words: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late Qing Dynasty; pedigree; classification; Orient Chinese; characteristic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已有学者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学术渊源关系^[1-4]，但还没有人做进一步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对这个关系进行有效的清理和定性。

一、清末中日文言语法书《汉文典》

(一) 日本明治末期《汉文典》著作

日本明治末期的《汉文典》比较著名的有9种，以下按发表时间顺序列出：

1. 冈三庆《新创未有汉文典》(出云寺高出版 1891年版)。分上、下卷。上卷,83页。与冈三庆《冈氏之中国文典》文言体系基本一致，此书是简化了的《冈氏之中国文典》，由大代信义作序。冈三庆在《编次及其引书等》中说自己编写了《用字明辨》及《冈氏之中国文典》。此书语法体系依据美国学者日根尾《英文典》，和《冈氏之中国文典》所述基本一样，此不赘述。这个《汉文典》还是以传统的词类划分理论为主，没有超出《冈氏之中国文典》的语法体系范围。但因为是教科书，比《冈氏之中国文典》论述更为明晰而简练^[5]。
2. 猪狩幸之助《汉文典》(金港堂 1898年版,150页)。本书体例构成：绪论、凡例、正文。其附

录为《韵镜》的解释、字音假名遣两部分^[6]。

3. 上田稔《中等教育教科用书:汉文典》(甲斐治平 1901 年版,18 页)。“凡例”提到,此书为师范学校和中学生所用之教科书,体系也是模仿《英文典》的。在“序言”中作者说,本书结构模仿《国文典》,取英文法则而通汉文法^[7]。

4. 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富山房 1903 年版,248 页)和《续汉文典》(富山房 1903 年版,220 页)。《汉文典》:第一篇,文字典。第二篇,文辞典。《续汉文典》则为:第一篇,文章典。第二篇,修辞典^[8]。

5. 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东京六盟馆 1905 年版,61 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9]。
6. 普通学讲习会《汉文典:表说》(此村钦英堂[ほか]1907 年版,87 页)^[10]。
7. 八木竜三郎《汉文典表解:言文一致》(大冢宇三郎 1907 年版,116 页)^[11]。
8. 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六合馆 1911 年版,548 页)^[12]。
9. 中等教育学会《汉文典:表解细注》(《表解细注问答全书》第 11 编,修学堂 1912 年版,206 页)^[13]。

牛島德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对冈三庆《冈氏之中国文典》、儿島献吉郎《汉文典》、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进行了论述,既涉及了日本《汉文典》之间,以及与《英文典》的关系,也触及了与中国马建忠《马氏文通》的联系,但未提到猪狩幸之助《汉文典》、八木竜三郎《汉文典表解:言文一致》、上田稔《中等教育教科用书:汉文典》等著作。袁广泉《明治期における日中间文法学の交流》涉及《汉文典》类比较多,但没有区分文言书面语和官话口语^[4]。中国学者的著作提到了来裕恂《汉文典》和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强调了中日《汉文典》的关联,但讨论话题还是十分有限。

(二) 中国学者来裕恂《汉文典》和章士钊《中等国文典》

1. 来裕恂《汉文典》(商务印书馆 1906 年版,7 卷)。现在一般学者能够见到的是《汉文典注释》本(高维国、张格注释,南开大学 1993 年版)。《汉文典》分为《文字典》与《文章典}^[14]。

中国学者对来裕恂《汉文典》的研究大多是从文章学和写作学角度展开的,比如方春《一部颇具价值的写作学理论著作——〈汉文典·文章典〉评介》,介绍了《汉文典》两方面的成因,评介了《汉文典·文章典》体系进一步完善、内涵更丰富广博的独特价值,指出了其不尽如人意及有失偏颇处,呼吁写作学研究及教学界要更加重视对《文章典》的研究^[15]。宋文《〈汉文典·文章典〉研究》认为,此书是清末民初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一部有关写作学理论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①。

曹聰孙敏锐地指出,来裕恂《汉文典》有语言学理论的“卓见”,为我们建立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做出了贡献。《汉文典》所述语法以词法为主,“字品”就是对词分类^[16]。姜望琪讨论汉语的“语法”概念及术语的起源和流变时认为,从中国的语言研究史看,中国传统的语法概念是广义的。它不等于单纯的词法加句法,还包括章法和篇法。汉语语法概念的狭义化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他提到了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章士钊说,“文典”包括词性论和文章论两部分,但章士钊论及文章论的内容很少。“文典”包括词法学和文章学内容,在具体实践上,做得最好的还是来裕恂,他把文法和文章学统一起来了。因为研究的是书面语,文法和文典是同义语^[17]。姜望琪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即来裕恂《汉文典》“文典学”就是“文法学”,而不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文章学”。

无论是来裕恂,还是章士钊,关于“文典学”也即“文法学”的理论构架源于何处,曹聰孙和姜望琪都没有谈,但这是理解“文典学”式的“文法学”的关键。

^① 参见宋文《〈汉文典·文章典〉研究》,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

2.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 1907 年版,284 页)。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商务版《中等国文典》印了近二十版,可见发行量之大。《中等国文典》是继《马氏文通》而作,体系基本相同,研究的是文言语法^[18]。本书曾获得语言学家陈望道、黎锦熙等人的好评。

郭双林、朱铭、李日与郭春香等论述了《中等国文典》的学术贡献^[19-21]。只有姜望琪真正论及章士钊构建“文典学”式的“文法学”的理论创新性^[17]。梅晓芳和袁广泉也论及了与之相关的内容,比如对英语和日语文法“品词”分类的借鉴问题^[3-4]。梅晓芳认为,从章士钊对汉语基本词类的划分(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接续词、助词)可以看出,章士钊所使用的术语大部分是对《马氏文通》术语的继承,而“形容词”、“副词”和“接续词”这三类词的名称则明显与《马氏文通》的用法不同,可能来自于日本的语法术语。这一点从“接续词”这一用语上也可看出,但“接续词”的称谓并没有在后来的汉语语法书中得到使用,而“形容词”和“副词”则一直沿用下来。“形容”这一表述在传统的汉语研究中就出现过,但是没有明确用来指称“形容词”,而在《马氏文通》之前,由美国人高第丕编写的《文学书官话》中曾用“形容言”表示“形容词”,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英华字典中也有使用“形容字”来表达“形容词”的用法,如《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1902)、《商务印书馆袖珍华英字典》(1904)等,但并未在《马氏文通》中得到体现。而章士钊从日本的词类术语中引入“形容词”这个术语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章士钊留学日本的时候,“形容词”这个术语在日本的语法研究中已经比较稳定了,是当时日本各文典中表示“adjective”比较固定的术语。邵敬敏指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确立了“副词”这一称谓^{[22]52}。

二、清末中日文言语法书《汉文典》“谱系”确认

牛岛德次以《马氏文通》传入日本为分界,对日本的明治时代汉语语法发展历程的研究进行了考察,似乎《马氏文通》对当时日本汉语语法研究上真的是发挥了巨大作用^{[2]37-38}。从《汉文典》的产生和传播过程来看,《马氏文通》的作用还很有限,至少是没有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不以《马氏文通》传入日本为分界,那么,从何入手探讨日本明治时代汉语语法发展历程呢?我们认为,如果从清理清末中日众多《汉文典》的学术关系角度,则可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识。

如何才能理清这些《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从这些《汉文典》之间“谱系”入手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谱系”,是指中国文献中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相关联的书,比如《隋书·经籍志二》:“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语言学“谱系”研究源于进化论谱系理论。达尔文进化论围绕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与发展,引导人们探索各种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或称进化谱系。这种理论当然也影响到了欧洲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上的谱系分类法又称“发生学分类法”,是根据语言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地理位置、亲属关系进行语言分类的方法。借用谱系观念探讨清末中日《汉文典》内部各种关系,对于找出它们之间在结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对应关系和异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清末中日文言语法书《汉文典》“谱系”,当然也需要运用到“谱系分类法”。谱系分类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形态体系的近似”^{[23]223}。如何确定“形态体系的近似”?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比较,通过比较才能看出同“谱系”文献之间的共性关系和个性差异。但比较要有着眼点,比如是从语音入手,还是从语法、词汇入手?语言要素的选择,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确定语言亲属关系即“谱系”的关键。

对清末中日文言语法书《汉文典》“谱系”的确认,我们也有自己的着眼点。本文认为,凡例或序言中的理论观念、编排的逻辑结构、语言要素的呈现、功能体系,是判定《汉文典》“谱系”关系的基本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清末中日文言语法书《汉文典》“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

“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

三、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汉文典》

牛岛德次从大槻文彦《中国文典》追溯日本现代文言语法理论源头的想法是难以让人认同的^{[2]38-42},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冈氏之中国文典》“文法”理论体系与大槻文彦《中国文典》有必然联系。

冈三庆在《新创未有汉文典》的“编次及其引书”中明确说道,自己所编写的《用字明辨》及《冈氏之中国文典》,语法体系依据中国学者虚词著作及美国学者日根尾《英文典》。

《用字明辨》就是《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冈三庆、堀口惣五郎,1877),又名《汉文典》^[24]。其扉页注记明确说明:“据清国徽水唐彪翼修所著《虚字用法》及《英国文典》”。《作文用字明辨序》由恕轩信夫粲撰,其中称:“明乡受业节富森田子,其于文章,眼光如炬,尝著《轨范文法明辨》若干卷,盛行于世。今又出其余蕴,以嘉惠后学。”森田子就是森田节斋(1811—1868)。森田节斋是江户末期著名的汉学家,对冈三庆影响至大。《文章轨范文法明辨》为森田节斋述,冈三庆编(完成于 1876—1880)。在《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自序》中,冈三庆叙述了编写的过程:“吾固无创并之才,而夙忧汉无文典之设,每读古文,致思于兹。用力之久,遂至豁焉贯彻之境。再执夫《文字窍》与《虚字用法》,互(齎)而订参之以《英文典》,渐得详而备,而取例子唐宋汉周文,卒作为此书。”^[25]

在《杂辨十三则》中,冈三庆介绍其“采据”例句的书籍,分为小学类、语录类、注疏类、杂记类、史略类、诗类、论语类。而“所取制造适合此编法式的‘粉本’”四种则是:《虚字用法》、《文字窍》、《经传释词》和《英文典》。前三种由中国学者所著,冈三庆强调,着重在“辞之区别解释”;关于后一种,冈氏称:“汉和之人,固知辞之精别。是为作此编,而得以借此稍学洋之辞区别法。”可见,中国学者虚词著作及《英文典》是其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目录:一,起语辞。第一类,正起语辞;第二类,假起语辞。二,接语辞。第一种,直接语辞。第一类,正直接语辞;第二类,假直接语辞;第三类,指示直接语辞;第四类,杂直接语辞;第五类,异直接语辞。第二种,反接语辞。第一类,反接虚问辞;第二类,反接不然辞;第三类,反接反诘辞;第四类,纯反接辞;第五类,进步反接辞;第六类,代名接辞;第七类,奇装反接辞;第八类,奇异反接辞。三,进语辞。第一类,小进语辞;第二类,大进语辞。四,转语辞。第一种,小转语辞。第一类,小转反语辞;第二类,小转疑语辞;第三类,小转带若辞;第四类,押耳小转语辞;第五类,杂小转语辞;第六类,思想小转语辞。第二种,代名转语辞。第三种,假转语辞。第一类,思想假转语辞;第二类,指时假转语辞;第三类,已然假转语辞;第四类,省文假转语辞;第五类,杂假转语辞。第四种,大转语辞。第一类,两通大转语辞;第二类,专用大转语辞。五,名语辞(冈三庆小字原注:所谓名词是也)。六,代名语辞(冈三庆小字原注:所谓代名词是也)。七,用语辞(冈三庆小字原注:所谓动词是也)。八,助用语辞(冈三庆小字原注:所谓助动词是也)。九,衬语辞(冈三庆小字原注:所谓副词、前置词等是也)。第一类,纯衬语辞;第二类,指示衬语辞;第三类,接转衬语辞;第四类,杂衬语辞;第五类,助语衬语辞;第六类,虚用衬语辞。十,束语辞。十一,叹语辞。十二,歇语辞。第一类,顺歇语辞;第二类,逆歇语辞。歇语辞用法余辨。

《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与大槻文彦《中国文典》都在同一年出版,但前者语法理论体系更为明确,依据中国学者虚词著作、美国学者日根尾《英文典》而写成。后来的《冈氏之中国文典》已经将术语由“辞”改为“词”,不用名语辞,而用名词;不用代名语辞,而用代名词;不用动语辞,而用动词,等等。理论来源十分清楚。另外,大槻文彦《中国文典》研究的对象是汉语言官话口语语法,而冈三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研究的对象是汉语文言书面语语法,文体性质不同,对象也不同。

与冈三庆《开卷惊新作文用字明辨》、《冈氏之中国文典》、《新创未有汉文典》相似的,还有上田

稔《中等教育教科用书：汉文典》等，泰西“文法”理论脉络十分清楚。这是毋庸置疑的。

上田稔《中等教育教科用书：汉文典》“绪言”称，有学者把汉文法作为汉语修辞学的一部分，但这是不正确的。此书结构模仿《汉文典》，但法则依据《英文典》。“凡例”也称：取例务求平易、脍炙人口^[7]。因为教学对象是中等师范学校等学生，所以，力求简洁、条理清楚。至于术语的使用，也是力求学术界能够接受而常用的。

具体论述，如名词：从性质上，分为普通名词和固有名词；从结构上，分为单纯名词和复合名词两种。还专门讨论“名词的格”，比如主格、宾格、呼格。代名词则分为人称代名词、指示代名词、关系代名词三种。人称代名词又细分为自称、对称、他称、不定称四种，这里把他“彼”看作是他称。指示代名词分为事物代名词（之、其、彼、孰）、地位代名词（此处、其地、彼所、某处）、方向代名词（此方、其方、彼方、一方）。与现在许多学者认定的人称名词、指示代词观点有所不同，有些不是词而是词组。对形容词的讨论，他认为，形容名词、代名词意义的，比如青山、白鹤、庶民。今天的学者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有嫌简略不说，还很不周全。具体涉及每一个词定性，还值得重新考虑。

姜望琪称，章士钊认为“文典”包括词性论和文章论两部分，亦即构建“文典学”式的“文法学”体系，但毕竟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上，从具体实践上来说，还是泰西“文法”思维模式占了上风，《中等国文典》就是如此，也是属于泰西“文法”系著作^[17]。

四、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汉文典》

（一）猪狩幸之助《汉文典》

牛岛德次没有提到猪狩幸之助的《汉文典》，这是个很大的遗憾，这部与《马氏文通》同一年发表的著作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猪狩幸之助《汉文典》当是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的一个代表性著作，为何如此说？因为它在以“文法”为主体形式的同时，还注意穿插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内容，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大有突破语文学藩篱束缚、昂首阔步迈向汉语语言学的气势。

猪狩幸之助《汉文典》的“序论”很像一篇《汉文典》汉语语言理论的“宣言”，涉及字体、文字的构成、音义、四声、字音、字书、外国语汉译、汉译音、训读九个方面问题，有一些观点就今天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具有明确的“汉字文化圈”视野。“序论”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朝鲜以及本朝（日本）文书所用历来是汉字，其渊源甚深，因此，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其研究极有趣味。”

论及字体，猪狩幸之助认为，有“八体”、“三体”的阶段性区别。汉字同音同义但字体歧异，面对这种情况，《正字通》本着“从古遵时，古今通用”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元明清“官话文体”字书应运而生。“汉字的别体”，比如日本、越南、朝鲜制汉字字体构成，也是应该重视的。论及文字的构成，以“六书”来说明，但社会上常用的汉字不超过五千个，《说文解字》等字书超过了一万个，后来不断增加，达到了五万个。为何？需要进一步思考。论及音义，他说每个汉字存在固有音义，但每个字一音一义的现象很少，一字数音、一音数义、多音多义很多，这带来了一些学者在解释上的谬误。《字汇》区别本音和别音；《音韵日月灯》韵母卷在每个字的右侧以“众（一字数音）独（一字一音）之字”加以区别。论及四声，外国学者认为这是汉字字音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五音集韵》则区别六声：上平、中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描述了中国各地四声的分布情况。论及字音，自古以来，字音不是一层不变的，变化次序应该证之于书面文献，杨升庵、顾炎武、吕维琪、江永等的著作十分严密，但有隔靴搔痒之感，古韵今韵之别、通韵叶韵之说、等韵等应该论及。加上本土之音，有日本汉音、吴音、朝鲜音、安南音四音，无论如何，都是比较研究的好材料。此外，中国各地“土音”不同，亦不可等闲视之。广东、厦门等方言与古代字音相近，近来欧洲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论及字

书,从部首而论,字书有三种:《说文》、《释名》、《尔雅》。字画倚重偏旁解释文字,这类字书还有《字林》、《玉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等。韵书甚多,如《广韵》、《五音集韵》、《古今韵会》、《洪武正韵》、《佩文韵府》等。对于字书,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检字、辨形、运笔、略字等诸项目。论及外国语汉译,以汉字翻译外国语,从汉代与西域相“交通”之际就已经开始,运用梵文汉译。其后,翻译蒙古满洲西藏语。明代以后,用汉字翻译欧美语。但同音的文字很多,而且正确书写它们需要用数十个汉字,很多情况下是用数个汉字来表示一个意思。所以,用汉字推测“原音”比较容易。“邦人”(日本人)音训并用,如“浦盐斯德”之写作,汉字滥用实在是达到了极点。论及音读,举了日本佛经汉音、吴音注读之例,比如空海所著文献。论及训读,汉学东渐日本后就用了训读之法。日本人要解释其汉字意义,就施加“和训”,读汉文就用“邦语”(日语)。因袭之久,用功极深,但“彼我言语性质”本来不同,其中有“破格的读法”,不得不靠自己揣摩。所施加“返点”,附加“送假名”,应该注意。德川以后,汉学勃兴,“道春点”、“一齐点”、“后藤点”之流盛行于世,自立门户、相互争斗。学者们认为,“道春点”最可信据,以其“语格”为正。如此,利用“训读”研究汉语,就要理解它的复杂性特征。

猪狩幸之助为何在《汉文典》的“序论”中提出如许多的研究课题?这和《汉文典》理论体系构建有何关系?这确实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此书“凡例”称:“从来就是国语有国语文典,外国语有外国语语文典,但汉文却没有文典,这在教育上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而该书就是为此而作,这点明了写作本书的目的。又说:“日本人写汉文,读书,主要以古文为主,所以,本书写作又是以供日本人钻研古文的基础为目的。对本书所涉及的用语都进行解释,如此,读者才会理解本书大要。吾人从来驯服于破格的训读法,却不讲文法,此等弊习应该破除。”“引用书很多,限于《史》、《汉》以上者。”“本书还参考了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Watter,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伊藤东涯《操瓠字诀/补遗》、《新刊用字格》; 东条一堂《助辞新释》。”又强调该书是在上田万年教授校阅并指导下写成的,这表明上田万年教授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意识对他的影响十分突出。

(二) 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

该书编者先安排了一个“文字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分为“构成”、“转借”两类。在“构成”中所列第二层次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在“转借”中所列第二层次是转注、假借。为了说明,还举了一些实例。其次,安排了“声韵表”。“声韵表”主要是“四声”即平上去入。按 106 韵《平水韵》形式,每一个声调都附上相应的韵目。至于声母是什么则不列。实际上,“声韵表”以韵目、四声为主线,没有声母,也是残缺不全的“声韵表”。第三项就是“语表”(品词表),分成十个类别。可贵的是列有“文的种类表”,即句的类别表。比如结构分类,有单文(句)、复文(句)、重文(句);而从性质分类,则有叙事、疑问、命令、感叹四种文(句)。还有“文(句)的成分表”,分为主语、说明语、客语、修饰语四类。最让人惊奇的是,专门列有“兼有两性之语表”,比如兼有副词和助动词者(未需)、兼有动词和助动词者(使遣令)、兼有代名词和助终词者(诸)。这是承认了汉语词类的“跨类性质”,就是在今天,这个认识也是非常到位的^[26]。另外提到“语的变化”,主要是表明“一字多义”、“一字多词”性质,比如:“与”有六种意义,“义随音转”^[27],还兼有副词、接续词、动词、疑问终词四种词性。可见,分析非常细致。与猪狩幸之助《汉文典》一样,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是十分明确的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体。

(三) 普通学讲习会《汉文典:表说》

该书有四编。第一编,文字篇。用图表的形式主要讲了两项内容,一是汉字及音训,二是和字。在“汉字及音训”中,专门列有“六书表”、“音和训表”、“汉吴唐音表”。“六书表”分“构造法”(象形、指示、会意、谐声)、“使用法”(转注、假借)两类。“音和训表”,比如“音”讲“一字一音”,也讲“一字二

音、三音、四音”的。还说明有“汉吴唐音”三音类别。很显然，这是就日语语音汉字音层次来说的，并不是就汉语语音史来说的。而“训”注意区别“汉语汉字的意义”和“日语汉字的意义”。“汉吴唐音表”则就汉音、吴音、唐音举例说明。“和字”分解说（强调是指日本当用汉字）、一般运用（日本通行的）、新近制作（日本明治末期流行的）三部分，有意与汉语中的汉字进行区别。

第二编，品词篇。对名词的种类划分很有意思，分为单语、熟语两大类。单语分有形、无形两类。熟语之下分类就更细，有八类：意义相对者（日月、昼夜）、意义相反者（大小、老少）、意义相同者（战斗、家屋）、名词和形容词复合者（苛政、猛虎）、名词和动词复合者（怒涛、战国）、动词熟合者（游戏、兴起）、助词和助动词熟合者（不欲、五亩之宅）、同字相叠者（人人、年年）。代名词分为人代名词、指示代名词、关系代名词、复合代名词四类。人代名词分为本来的（自称、对称、他称、不定称）、其他品词转来的（自称（仆、孤臣）、对称（陛下、先生）、他称（寡君、细君））。指示代名词分为近称、中称、远称、不定称。关系代名词，比如“者、所”。复合代名词，比如“自、躬、亲”等。动词也分为本来的、其他品词转来的、自动词、他动词、自他五类。助动词分为十类，更细：受身、使役、可能、否定、断定、指定、反语、时、叠语等。副词分为结构、性质两大类。接续词分为单纯的、接副词的、接续句子三类。助词则分为前置、后置两类。终尾词分为指定、疑问、感动三类。

第三编，文章篇。“文（句）的要素”有：主语、客语、补语、述语。从位置来说，有正序法、颠倒法、省略法。还专门讲修饰语。“文（句）的结构种类”有：单文（句）、复文（句）、重文（句），和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一样。“文（句）的词类所属种类”有：形容句、副词句、名词句。“文（句）的性质种类”有：平叙体、疑问体、命令体、感动体。

第四编，文（句）的构造法。主要着眼于词与词之间构造关系，比如，名词和自动词（主语和述语）、代名词和自动词（主语和述语）、名词和形容词（主语和述语）、代名词和形容词（主语和述语）、名词和副词动词、名词和他动词（客语）、名词和自动词补语等，非常具体。重点放在句子的内部结构特征揭示上，这是《汉文典：表说》一个十分突出的“文法”研究特色。

（四）中等教育学会《汉文典：表解细注》

该书编者在“凡例”中称，此书为各类中等学校学生和小学教员考试专用复习参考书，带有标准“文法”名签。行文力求简洁、实用，“表”“注”相配套。

其“文字”部分，分构成（象形文字、指示文字、会意文字、谐声文字）和用法（精法、转法、意义）两大部分，在解说上更为细致。其“声韵”部分也是“四声表”：按 106 韵《平水韵》形式，分平上去入，每一个声调都附上相应的韵目，不列中古声母“三十六字母”。“声韵表”以韵目、四声为主，仍然让人感到“残缺不全”。

和六盟馆编辑所《汉文典表解》一样，“语的品词”分“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助动词、副词、接续词、助词、感动词、终词”十类，注解时强调“意义”，列举实例说明。“语之位置”则分别讲述各类型词所处句中的位置和功能情况，比如名词，作主语、客语、间接目的、主语及客语的修饰语。而代名词，编者认为和所有的名词不同，但如何不同没有讲。对名词的分类，从来源上区别，比如本来名词、来源于动词的、来源于形容词的、来源于副词的、来源于成语的。从性质上区别，分为普通名词、固有名词。对名词的作用，提到了主语、客语、补足语、在他动词下作客语补足语、在客语之上（倒装句）、客语补足语原初形式、修饰语。代名词分为人称（自称、对称、他称、不定称）、指示（事物、地位、方向）、关系（代表人或事物，连接前后句）三类。动词分为本来动词、名词变来动词、形容词变来动词、副词变来动词、助动词变来动词，从性质上分为他动词和自动词。形容词分为本来形容词、名词变来形容词、代名词变来形容词、动词变来形容词、成语用为形容词、叠语用为形容词。形容词在文章中的位置，作为说明语、作为修饰语。其作用为：在名词之上，起修饰作用；在名词之下，是说明

语,说明动词的工作;位于前置词之上,用于比较。副词则分为本来副词、名词变来副词、形容词变来副词、动词变来副词、成语用为副词、熟语用为副词。从性质上区分,有场所(于,现在是介词)、时间(方今、今日、后世、以后、昔者、古者)、方位(东、西、南、北、上、下、乾、坤)三类,现在大多列入名词里。助动词分为受身、可能、打消、狭役、时(未来)、推量、指定、反语几类。助动词作用:位于动词之上,表明动作完成;位于形容词之上,表现状态;位于副词之上,表示限定意义;位于名词代名词之上,表示动词动作完成;助动词连用,表示持续意义;助动词连用,表示意义省略;等等。

作者列了“和国词一致的汉文表”,确实是一个特点,带有比较意味。有“名词和名词连接”、“名词和自动词连接”、“名词和形容词连接”、“副词和动词连接”、“副词形容词名词连接”。还列有“和国词不一致的汉文表”,有“名词和他动词连接”、“名词和补足语,主要是和助动词连接”、“两个助动词重叠,和动词连接”、“助动词和动词的连接”、“助动词副词以及和动词连接”、“名词和名词的连接”、“代名词和代名词连接”、“动词和动词的连接”。

“语(词)的变化”,讲了“词的用法多样化”,比如“之”,有助词、动词、代名词、转倒法四种。“兼有两种性质之语”,讲的是“兼类词”,比如“当、应、和、将、且、宜”兼有副词和动词用法。“文(句)成分的位置”,如主语、说明语、客语、修饰语,也讲正序法、转倒法、省略法三种。“句”,分附属句、独立句。“文(句)的种类”,从结构上分,则有单文、复文、重文。从性质上分,则有叙事文、疑问文、命令文、感叹文。最后,专门讲“呼应法”,分为即已矣呼应、决呼呼应、未也呼应、非也呼应、岂也呼应、尝矣呼应、不我连用、不我运用八类。实际上,这讲了句尾语气词和句中语气词,有的还是副词。

《汉文典·表解细注》术语运用比较混乱,比如“句”,就有文、句两种说法,还没有注意区别词和词组。体例安排上也问题不少,比如谈名词功能在先,而谈分类在后,又不是放在一起说明,连续性很差。在具体的词类之下小类分类上以偏概全,比如“呼应法”,就是不科学的。此外,用日语汉文代替汉语,与实际汉语不符,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即便如此,笔者认为,《汉文典·表解细注》仍然是《汉文典》一类“文法”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可以称作是日本明治末期有意识将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的典型。

五、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汉文典》

(一) 儿岛献吉郎《汉文典》

儿岛献吉郎在《汉文典》“例言”中针对有学者提出该书“参酌《国文典》、《欧文典》”这一问题回答道:“我初次读涅氏《英文典》及大槻氏《广日本文典》而聊有所得,于是就立志开始写一部《汉文典》。后来,获得马氏《文通》及猪狩氏《汉文典》,我心甚慊焉。因此,为实现前志,遂提笔为之起稿。时至明治 34 年 7 月草成。”这说明其语法理论来源于日本大槻氏的《广日本文典》和美国涅氏《英文典》文法体系。他在读了马建忠《马氏文通》和猪狩幸之助《汉文典》后又难以落笔,原因在于,诵读所有文法书后,又陷于深深的“模拟”恐惧之中。于是,他下定决心,走出一条不同于前人的文法研究之路。他说:“此书的体裁,和何人《文典》有一致的地方,我是知道的。此书的分类,和何人《文典》有所不同,我也是知道的。”儿岛献吉郎直截了当地解释说:“训读汉文,其语法,以《国文典》的法则律之;音读汉文,其语格,以《英文典》的法则论之。”

为何要把传统“小学”纳入到《汉文典》“文法”体系中来?作者也进行了说明:“说起汉字之不便,有人说,汉字的笔画容易错;还有人说,汉字的音义难记。这是不了解汉字的教授法,妄自归罪于汉字。顾我邦人讲读汉字,六书在后,经史子集解义在前。这是在大的顺序上出现了谬误。无论如何,从整体上辨识六书,了解文字上的构造法,此乃小学之事。推演经史子集意义,是大学之事。

然而，我邦从来的汉文教学法，不是先教以小学课程，却直接先教大学教程，这是导致我邦人笔画谬误多的重要原因。况且，汉字本来从象形发生，所以，教诸生以六书之义，就很容易理解，也是最容易记忆的。而且，体察汉字的偏旁等，就可以大概了解文字的性质。所以，我切望改良教学法。这也是本书第一篇述及文字的构造及其音韵训诂的原因。”^{[8]4}可以看出，作者认为，讲传统“小学”知识是理解文法的前提，从教学法的角度也应该如此考虑。

设置“文辞典”的考虑是，“从来(日本)汉文讲习的方法，因为用了训读法，就唯有存在解释上的误解；文章上存在着‘转倒’之弊，此即本书第二篇着重写文辞典‘诸词的关系及其位置种类’”^{[8]4}的原因。

儿岛献吉郎设置“文章典”和“修辞典”的原因何在？在《汉文典》“例言”中作者没有提及。《续汉文典》因为没有“例言”，也更是无从寻求缘由之所在。

关于“文章典”，也可以从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正文”中窥见一二。在《文章典》中，儿岛献吉郎说：“文章典，就是讨论文章构成的典则。文章典的功用，就是指示做文章规律的方法，帮助人们正确理解章句意义，把握文章的性质。”“文章，从语言上说，就是文法上的品词集。以作句、为章、成篇为宗旨，彰显意义。所以，文章典论述的范围，在于用字造句的方法而推及篇章的‘方则’。”“文章，在一定的典型形式之下，连接各种品词，尽力表达人们的情思意想。”^{[8]1-2}从“文法上的品词集”、“用字造句的方法”角度理解，儿岛献吉郎的“文章”还是“文法”观念上的“文章”，而不是现在许多人理解的“文章学”的“文章”。

关于“修辞典”，在《修辞典》第一章“绪论”中提到：“修辞典，止于教授构成规则的文辞法则，指示写作优美文章的方法。”“文章达意，有两种修辞，即规律和典型。达意之文，以正确和明晰为主，即能够抒发自己的意思，又能够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虽然，修辞之文，一定遵守规律典型，有抑扬，有收放，有正反，有详略。在正确之中求得圆活，在明晰之中意达婉曲。”^{[8]117}“修辞就是使所写文章，具有美术的技能”；“修辞功用，恰恰与绘画、雕刻、写真相似。绘画、雕刻、写真，直觉地显示山水人物花鸟的实相，而文章，则是想象中的现实山水的景致、花鸟的色相、人物的性质及其行为。即文章家依靠技术家的形线，直接地诉诸视觉力，交给读者去想象，其真相从胸中浮现出来。”^{[8]118-125}可见，儿岛献吉郎《修辞典》已经走出了语言学范畴，进入到了文学创作范畴。

虽然如此，儿岛献吉郎并没有忘记“修辞”的语言特性。比如在“序论”中说道：“把在修辞上，讲求文字修饰使用功夫，叫字法；讲求语句排列，叫句法；讲求段落节次配置，叫章法；讲求一篇文章的结构安排，叫篇法。”^{[8]125}应该说，《修辞典》七章中有四章与此有关，这确实不是偶然的。比如字法章对“字法分类”，就有“假借用法、比喻用法、省略用法、婉曲用法”四种，一定要和“品词”研究结合起来，比如就有“假借用法转为品词特有意义”^{[8]141}的认识，讨论到了“名词假借法”和“动词假借法”上来。

由此，可以认定，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汉语语言学范畴，所谓的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性，还是贯穿着“文法”这个主线。他研究汉语文言语法的创造性也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可惜的是，许多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贡献。

来裕恂《汉文典》“序”对儿岛献吉郎等学者的批评失之偏颇，说他们“断以臆说，拉杂成书”，“非徒浅近，抑多讹舛”^{[14]2}，这不符合实际。来裕恂于1903年赴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教育，对日本汉语语法学熟悉是可以肯定的，在写作《汉文典》时，不可能不注意接受日本学者汉语语法理论。从笔者判断来看，来裕恂《汉文典》应该与儿岛献吉郎《汉文典》更为近似，参照他的《汉文典》构建自己的《汉文典》理论体系可能性更大。比较来裕恂《汉文典》与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它们的近似之处如下：

- 1.“典”的命名。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第一篇就是“文字典”；来裕恂《汉文典》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设置也叫“文字典”。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第三篇是文章典，来裕恂《汉文典》第二部分设置也叫“文章典”。

2. 设置“文字典”和“文章典”的宗旨。对于儿岛献吉郎《汉文典》设置“文字典”的理由，《汉文典》“例言”说得直截了当，就是“改良教学法”。理解“汉文法”，先要知道文字的构造及其音韵训诂知识。来裕恂《汉文典》“文字典序”说：“读书必先识字”，“然欲研究，不外解字”。“解字之要，惟形、声、义。字之不识，乌能缀文？此识字所以为作文之阶梯也，爰作《文字典》。”文字学的应用功效可见一斑。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关于“文章典”说：“文章典，就是讨论文章构成的典则。”“文章，从语言上说，就是文法上的品词集。以作句、为章、成篇为宗旨，彰显意义。所以，文章典论述的范围，在于由用字造句的方法而推及篇章的‘方则’。”而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序”则说：“战国以来，诸子原本六艺，著书立说，文章之学，遂极专家之能事。”但后来处于“斯学不替”、“卑弱”、“颓靡”、“末流”之势，“文日以荒，缀文之士，于是苦之，斯亦缺憾也，爰作《文章典》”。两者都在寻求作文的法则，由语言视角进而延伸到修辞表达手段，殊途同归。

3.“文字典”和“文章典”内容类别。以“文字典”而言，儿岛献吉郎《汉文典》“文字典”与来裕恂《汉文典》“文字典”大致对应的项目有：字形字音字义的关系/字之纲要；文字的创作/字之功用；文字的构造字之根本/形部，体制之学；字体的变迁字之起源/字之变化；字音的转移音韵之变迁/声部，音韵之学；音韵学声部/音韵之学；训诂学义部/训诂之学。

其他大致相重合的，比如儿岛献吉郎《汉文典》“文辞典”和来裕恂《汉文典》“文字典”之“字品”：名词（文辞典）/名字（文字典“字品”）；代名词（文辞典）/代字（文字典“字品”）；动词（文辞典）/动字（文字典“字品”）；形容词（文辞典）/静字（文字典“字品”）；副词（文辞典）/状字（文字典“字品”）；前置词（文辞典）/介字（文字典“字品”）；助动词（文辞典）/助字（文字典“字品”）；转接词（文辞典）/联字（文字典“字品”）；感应词（文辞典）/叹字（文字典“字品”）；歇尾词（文辞典）。

以“文章典”而言，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与来裕恂《汉文典》大致对应的项目有：解剖的观察，词句/句法；解剖的观察，篇章/句法；外形上的分类，词句/句法；内容上的分类，词句/句法；体裁上的分类，篇章/文体；性质上的分类，篇章/篇法（文要）；用字法，同字异用/字法；用字法，异字同用/字法；造句法，同义异形/句法；造句法，倒装/句法。

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修辞典”与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大致对应的项目有：文的品致/文诀，文品；文的疵病/文基，文忌；字法章法/转法，起法；句法/章法，篇法；章法/章法，篇法；篇法/章法，篇法。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也增加了许多儿岛献吉郎《汉文典》没有的内容，比如第四卷“文论”中的“原理”、“界说”、“种类”、“变迁”、“弊病”、“纠谬”、“致力”等，距离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修辞典”的语言学范畴越来越远，真的是走向了后来学者所说的“文章学”和“写作学”，恐怕这也是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独创之所在，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进行类比了。尽管如此，从中日汉语文言语法学《汉文典》研究的历史来看，来裕恂《汉文典》中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的“影子”处处都有，“遗传因子”还在，所以，把来裕恂《汉文典》归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一系，也不算是勉强。

来裕恂“字品”说道：“东文讲明词性，属于《文典》之第二部，西国文典亦如之，大致分字法、句法两种。中国讲明词句之法久已失传。秦汉以上多以国语入文，故有释词之法。至骈文兴，以积句积章为重，而释词之法废矣，厥后韩柳作古文，亦只讲积章之法，而词法鲜有究及者。中国于字之品性，大率分虚实两种。凡遇两实字，则必变其声读义异，其义解，故有实字虚用、虚字实用之曲说。盖中国素不知品词之道。”^{[14]74}

但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免不了受外来“文法”影响。名字（词）分为有形、无形、普通、特别、指示、复杂六类。指示名字，分为示时、示处、示计、示数四类。在示时指示名字之下，又分远过去指示词、

近过去指示词、最近过去指示词、泛然过去指示词、现在指示词、未来指示词六类，很细。动字分为自动、他动、使动、被动、同动、助动六类。静字分为品名、切指、泛指。一般认为，这里品名除少数是动词之外，大部分是形容词。切指、泛指包含了数量词、方位名词、指示代词等。其状字，有名词、动词、疑问代词，但大多数是副词，分为状时、状地、状象、状量、较别、和同、断制、约度、诘难九类。代字，分为指名、连接、切指、泛指、疑问五类。介字包含了一部分介词，也有助词、连词、副词。分为着所属之介字、着所在之介字、着所用之介字、着所由之介字、着所舍之介字、着所共之介字六类。其联字，就是连词，类辞联字、析辞联字、转辞联字、原辞联字、竟辞联字、譬辞联字、例辞联字、系辞联字八种。助字，分为起语助字、歇语助字（顿语助字、止语助字）两类。叹字分为慨叹字、怨叹字、赞叹字、惊叹字四类。

关于“文法”，来裕恂说道：“《易》曰‘有序’，《诗》曰‘有章’。序与章者，所以明言之有法也。中国自上古至三代，语言文字不甚相离，故能以词见法。魏晋以来，骈文盛行，于是尚造句配章之法。逮唐宋古文家又专篇章格调，而文法益密。故汉以前之文，因文生法；唐以后之文，由法成文。因文生法者，文成而法立；由法成文者，法立而文成。”^{[14]130}所以，来裕恂将“文法”分为：字法，讲语助、形容、分析、增改、锻炼、类用；句法，主要讲关系格调、节次、性质、声情、优劣；章法，讲起法、承法、转法、结法；篇法，讲完全、偏阙两种。完全法，比如提纲法、叙事法、照应法、比兴法等。偏阙法，讲相形、层叠、宾主、缓急、论断、预伏、推广等法。来裕恂“文法”已经完全脱离了西方句法范畴，进入到篇章、修辞、作文领域了。

（二）八木竜三郎《汉文典表解：言文一致》与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

八木竜三郎《汉文典表解：言文一致》没有序言，在正文前只有一个“例言表”，告诉人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对学生来说，是本好的参考书；对参加考试的人来说，是好伴侣；对自学者来说，是稀有的研究者。可见，夸大的成分很浓。本书体例很清楚，分文字、语言、文章三部分。与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的结构和内容设置非常类似，显然脱胎于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一系，只不过以“表解”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牛島徳次注意到了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55页），把它和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一同作为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后继著作来对待，但这其实也是主观性很强的判断。大槻文彦在《新撰汉文典》“序”中称赞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比起马建忠《马氏文通》和广池千九郎《中国文典》来，“另辟蹊径”、“更简洁”，这是很有道理的。

森慎一郎在《新撰汉文典》“绪言”中说：“本书讲读汉文，论述了与古体汉文有关的文法大要，仅供参考。论述的事项，按文字论、品词论、文章论三大编十六章区分，逐次论述。”“区分品词，参稽邦语及外国语，还斟酌汉字的特性，分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接续词、后词、感叹词九种。”“研究古汉语文法的著作，首称中国清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此书是以英语文法为基础解释汉文法的，论证充分，不过所立名目往往奇僻，读者难以晓解。”“近年在我国有广池千九郎、儿岛献吉郎及其他二三人的著作。这些人虽然有不少的建树，但其中尚有可商之处，故将此作为学习者的参考书，略感不足。”“本书参考了荻生徂徕《训译示蒙》、《译文笠蹄》，伊藤东涯《操瓠字诀》、《用字格》，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皆川淇园《助字法》，河北景桢的《助字鵠》，大槻文彦《国文法》，ネスフイールト、ペイン諸氏《英文法》。”

可见，森慎一郎《新撰汉文典》理论的来源是多向性的。就文法来说，也是欧美、日本、中国杂混在一起的，很难区辨清楚。宏观地看，文字论、品词论、文章论三大编的主体结构框架确实有章可循，已经讲明了自己的“参照系”就是儿岛献吉郎《汉文典》，所属谱系十分明显。因此，我们把他的《新撰汉文典》归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一系中，应该是可行的。

六、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原因和学术意义

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的原因和意义有四：

第一，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清末中日三种《汉文典》之间关系还停留在一般性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上。比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大槻文彦《中国文典》是《汉文典》的先导，以及《汉文典》受《马氏文通》影响等论断，都是先入为主。本文的研究毕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种从“谱系”角度的清理，让人们看到了清末中日《汉文典》发展基本脉络和特征，不管是否清晰，毕竟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第二，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中日之间语法研究关系比较复杂，早期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受中国虚词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甚至进入了语法研究的“基因”中去。人们经常批评的“训诂语法”就与这点关系密切，比如皆川淇园《助字详解》。富士谷成章总结中日语法传统，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语法观念，他的《插头抄》、《脚结抄》将词分为四类：名（名词）、装（动词、形容词）、插头（代名词、副词、接续词、感动词）、脚结（助词、助动词、接尾语）^[28]。但荷兰语言学、欧洲语言学进入日本的语法理论系统中后，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杉木つとむ《兰学和日本语》说：“现代日本语文法使用的文法术语，比如品词的各类称谓，无论如何是翻译语。”^{[29]73} 翻译语主要是欧美语文法理论，最早涉及的是日本语荷兰语文法。“和兰”文法翻译的鼻祖是中野柳圃（1759—1806），其重要著作就是《九品词名目》（1800 年前后）。《九品词名目》分词类为十种：发声词（冠词）、静词（名词）、虚词（形容名词、形容词）、代名词、动词、动静词（分词）、形动词（副词）、助词（接续词）、慢词（前置词）、叹息词（间投词）^{[29]74-85}。其次，又说到了他所发现的国会本、著者不详的《幡卷得师》（1828 年前后）。《幡卷得师》就以当时人所学习的“和兰”译语语法为框架，阐述了荷兰语语法对日语的影响。比如“九品”语法构成，分：“名言、附属名言、活言、代言、添言、接言、数言、上言、性言”^{[29]338-342}，与《和兰语法解》类似。英语语法的渗透是与日本人学习英语分不开的。庭野吉弘《日本英学史叙说》提到，日本“开国”后，美国“通译官”推进日美各类条约签订，并进行英语教育。一批日本学者，比如伊东贯斋、津田仙、津田梅子等，率先接受英语教育，进而在学校实施英语教育，其中语法教学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30]81-104}。明治维新以后，英语教育进入系统化时代，以英国“品词”为代表的《英文典》语法理论框架，使日本文言语法理论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变革，这是必须承认的。“泰西”语法的魔力太大，套用《英文典》语法理论研究汉语文言语法的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清末中国留学生学习语法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进而研究中国文言语法，“师夷之长，避夷之短，趋利避害”，后出转精，势所必然。来裕恂《汉文典》独领风骚，一点都不奇怪。“风水轮流转”，《汉文典》中心倾斜到了中国，但那预示着中国文言文语法研究很快会达到日本《汉文典》难以企及的高度。这种学术主线脉络的触摸，如果不是以“谱系”的眼光审视，是很难发现其中所蕴藏的奥秘的。

第三，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的确认，不仅仅是对清末中日《汉文典》关系的清理，更重要的是，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中日学者为构建《汉文典》文言语法体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不但是注意借鉴《英文典》和日本《国文典》，而且在对汉语文言语法原始语料的分析上也是殚精竭虑，充分挖掘汉语的语法独有特征，避免生搬硬套西方语法理论，找出了许多汉语文言语法独有的规律性东西，个性特征十分突出，由此，对汉语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这是他们优于西方学者的地方。从世界性的汉语语法学史来看，其学术意义重大，这种探索所带来的创造性贡献为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才有后来黎锦熙、王力语法学在日本汉语语法学坛二十多年的绝对优势地位。

第四，从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研究来看，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我们研究

汉语语法系统，一般没有考虑到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是文言和口语并重的。提起中国语法理论贡献一定要说马建忠，但很少有人会把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文言书面语语法联系起来考虑。为何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不以分析汉语官话口语为对象，却偏偏以书面语文言为对象？清末的中国文言书面文体是“正统”，就是在日本也是如此，所以，《汉文典》才一再进入到正规的中等教育的语法课堂中去，这是当时中日语言教育的书面语教育“同一性”使然。山东功《明治前期日本文典研究》提到，服部四郎从制度层面划分日本语言学史时代，比如明治十九年（1886）学校令的颁布为转换期。山东功认为，文法研究有其特殊性，应该以明治五年（1872）学制颁布为起始时间。在那个学制中，《小学教则》已经有了与今天相对应的“国语”关系科目：“缀字、习字、单语、会话、读本、书牍、文法”七个科目。“文法”科目规定，教授“词的种类”、“词的变化”等内容^{[31]96-101}。明治十九年学校令颁布，从制度上规定了语言学教学的合法性，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文法教科书体系。其中大槻文彦《语法指南》、《广日本文典》成为教科书的主流学说^[31-32]。

上田稔在《汉文典：中等教育教科用书》“凡例”第一句话就说：“此书以编写师范学校及中学校（初中）教科用书为目的。所以，说明问题，往往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有待于教师进一步补充，而有所教益。”在“绪言”中又强调：“师范中学校的学生，如今要修十七门各类课程。”^[7]汉文学史是日本自古以来“文物制度根基”，“东洋危机”之时，研究它尤其重要。但研究汉文学首先要研究“汉文法”，“汉文法”成为必修课。可见，当时日本中等教育制度已经将“汉文法”纳入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教学环节中来，教育制度催生出文言书面文体“正统”文法书，《汉文典》才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出现。“汉文法”的“日本国语”性质使《汉文典》异乎寻常地受到了青睐。今天认识《汉文典》存在，不要单从汉语文言语法角度去看待，也要认识到它是日本“国语”教育链条上一个重要的语言学习环节。《汉文典》的“双面标签”性质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根本。清末，中日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汉语官话口语为主体的“文典”性汉语教科书，看似风光无限，但却进不了“国语”语言教育的主流。实用性强，却在主流语言教育中居于“非正统”地位，是让人觉得很不公的。但从清末中日两国的语言教育实际来看，却非常正常。清末激荡着汉语国际教育的两条语法“湍流”，一个是正统的学校教育的文言语法体系，就是《汉文典》体系；另外，就是“非正统”的实用“速成式”的“书院汉语”，即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体系。语体不同，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同，清末中日《汉文典》文言语法“谱系”的典型性研究价值，恐怕也必须顾及这一点。如此，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后研究汉语国际语法教育史应该沿着这两个并行不悖的“路线”走，才会切合实际。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葛兆光以“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谈到了“分道扬镳”，即17世纪以后的东亚是否还有认同问题^{[33]165-168}。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以日本为“文法”学术主导，并引领“文法”学术潮流，确实使中华“文法”文化的“天朝中心”位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东亚学术中心的移动带来了东亚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汉语语法研究难以摆脱这个命运。对东亚汉语语法学史的认同不免出现了危机。我们强调东亚汉语语法学史研究的必要性，原因在于离开了东亚这个范畴，就会无原则地把东亚内部各种学术关系切割开，如此，就会陷入一种盲目混沌状态，东亚各类学术“谱系”的研究必然无果而终。汉语文言语法不对称是相对的，而中日《汉文典》“谱系”的时空交错存在却是绝对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认同是解决汉语文言语法学史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

清末中日三种《汉文典》“谱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延续性。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汉文典》类著作，比如民国以后，以文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法著作，有名的有戴克敦的《国文典》^[34]以及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35]等。《中国文法通论》颇受英国语言学家H.斯维特的《新英语语法》的影响，比如十分注意区分理论的文法和实际的文法。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参照刘复的书而又有所变通^[36]。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在词类区分上增加本用和活用^[37]，这在辨识词性方面有所改进。

稍后杨树达的《词诠》^[38]和《高等国文法》^[39]也是独树一帜,体系完整,但仍然可以见到早期“文典语法”体系的影子。

1912 年以后,日本继续出现了不少的《汉文典》著作。这表明,牛岛德次关于《汉文典》居于“二流”学术水平的说法并不客观^{[2]56}。1912 年以后,与《汉文典》相关的著作还有:石川诚《国语汉文提要:文检受验》^[40]、佐々木藤之助《提要文检汉文科组织的研究》^[41]及《文检参考汉文典》^[42]、山口经济专门学校图书课《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东亚关系图书目录(和汉书分类之部)》^[43]。这些著作不仅仅是继续《汉文典》教学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汉文典》历史,从学术史角度进行总结。由此可以证明,他们不是简单地沿袭《汉文典》传统,而是上升到了中日两国《汉文典》“文法”理论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不是一般性类比所能概括的。

我们总结清末中日两国《汉文典》“谱系”正是这种工作的继续,希望在《汉文典》学史回顾中,找到东亚汉语学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参 考 文 献〕

- 〔1〕牛島徳次:『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文法研究史』,東京:東方書店,1989。[Ushijima Tokuji,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in Japan*, Tokyo: Oriental Bookstore, 1989.]
- 〔2〕〔日〕牛島徳次:《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甄岳刚编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Ushijima Tokuji,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in Japan*, trans. by Zhen Yuegang,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海晓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词类划分及术语演变问题」,『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9 年 4 号,309 – 325 頁。[Hai Xiaofa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ed Terms,"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No. 4(2009), pp. 309 – 325.]
- 〔4〕袁廣泉:『明治期における日中間文法學の交流』,石川禎浩・狭間直樹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訳概念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3,第 126 頁。[Yuan Guangquan, "Exchange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Grammars in the Meiji Era," in Ishikawa Yoshihiro & Hazama Naoki (eds.),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n Modern East Asia*,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2013, p. 126.]
- 〔5〕岡三慶:『新創未有漢文典』,東京:出云寺高出版,1891。[Oka Sankei, *A New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Shinsō miyu Kanbunten)*, Tokyo: Hatsubaijo Izumoji Bunjirō, 1891.]
- 〔6〕猪狩幸之助:『漢文典』,東京:金港堂,1898。[Ikari Konosuke,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Tokyo: Kinkodo, 1898.]
- 〔7〕上田稔:『中等教育教科用書:漢文典』,大阪:甲斐治平,1901。[Ueda Minoru,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A Secondary Textbook (Kanbunten: Chuto Kyoiku Kyokayoshō)*, Osaka: Kai Jihei, 1901.]
- 〔8〕儿島献吉郎:『漢文典』,東京:富山房,1903。[Kojima Kenkichiro,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Tokyo: Fuzanbo, 1903.]
- 〔9〕六盟館编辑所:『漢文典表解』,東京:東京六盟館,1905。[Rokumeikan, *A Diagrammatic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Kanbunten Hyōkai)*, Tokyo: Rokumeikan, 1905.]
- 〔10〕普通學講習會:『漢文典:表說』,大阪:此村欽英堂[ほか],1907。[Futsugaku Koshukai,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by Diagram (Kanbunten: Hyōsetsu)*, Osaka: Himura Kineido, 1907.]
- 〔11〕八木竜三郎:『漢文典表解:言文一致』,大阪:大冢宇三郎,1907。[Yagi Ryusaburo, *A Diagrammatic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ernacular Style Writing (Kanbunten Hyōka: Genbun Itchi)*, Osaka: Otsuka Usaburo, 1907.]
- 〔12〕森慎一郎:『新撰漢文典』,東京:六合館,1911。[Mori Shin'ichiro, *A New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Shinsen Kanbunten)*, Tokyo: Rikugokan, 1911.]

- [13] 中等教育學會：『漢文典：錄解細註』，東京：脩學堂，1912。[Institu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Diagrammatic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with Detailed Annotation (Kanbunten: Hyokai Saichu)*, Tokyo: Shuga kudo, 1912.]
- [14] 来裕恂：《汉文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Lai Yuxun,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06.]
- [15] 方春：《一部颇具价值的写作学理论著作——〈汉文典·文章典〉评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8—140页。[Fang Chun, "A Valuable Theory Book for Writing Course," *Journal of Gannan Teachers College*, No. 1(2004), pp. 138—140.]
- [16] 曹聪孙：《有深度的一次宏观把握——〈汉文典〉评析》，《津图学刊》1994年第2期，第65—69页。[Cao Congsun, "A Book of Depth and Breadth: Comments on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Tianjin Library Journal*, No. 2(1994), pp. 65—69.]
- [17] 姜望琪：《汉语“语法”的源流》，《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66—74页。[Jiang Wangqi, "On the Origin of 'Grammar' in Chinese," *TCSOL Studies*, No. 3(2010), pp. 66—74.]
- [18] 章士钊：《中等国文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Zhang Shizhao, *Medium Dictionary of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0.]
- [19] 郭双林：《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文法体系》，《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第132—135页。[Guo Shuanglin, "Zhang Shizhao and th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 2 (2000), pp. 132—135.]
- [20] 朱铭：《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第34—45页。[Zhu Ming, "On Medium Dictionary of Chinese Grammar by Zhang Shizhao," *Extensive Reading*, No. 8(2001), pp. 34—45.]
- [21] 李日、郭春香：《试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第52—57页。[Li Ri & Guo Chunxiang, "On Medium Dictionary of Chinese Grammar by Zhang Shizhao Contributing to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No. 2(2002), pp. 52—57.]
- [22]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Shao Jingmin, *On Chinese Grammar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0.]
- [23] [丹麦]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H. Pedersen,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by Qian Jinhua,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 [24] 岡三慶：『開卷驚新作文用字明辨』，東京：晚成堂，1877。[Oka Sankei, *Kaikan Kyōshin Sakubun Yōji Meiben*, Tokyo: Banseido, 1877.]
- [25] 岡三慶編、森田節斎述：『文章軌範文法明弁』，東京：晚成堂，1876。[Oka Sankei & Morita Sessai, *Bunsho Kihan Bunpo Meiben*, Tokyo: Banseido, 1876.]
- [26] 沈家煊：《语法六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Shen Jiaxuan, *Six Parts of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27] 王志成：《多音字分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Wang Zhicheng, *Research on Chinese Polyphonic Characters*, Taipei: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Publishing House, 1987.]
- [28] 山東功：『日本語の觀察者們』，東京：岩波書店，2013, 8—13頁。[Santo Isao, *Observers of Japanese*,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3, pp. 8—13.]
- [29] 杉木つとむ：『蘭學と日本語』，東京：八坂書房，2013。[Sugimoto Tsutomu, *The Dutch Impact on Modern Japanese Language*, Tokyo: Yasaka Shobo, 2013.]
- [30] 庭野吉弘：『日本英學史敘說』，東京：研究社，2008。[Niwano Yoshihiro, *A History of English Studies in Japan*, Tokyo: Kenkyusha, 2008.]
- [31] 山東功：『明治前期日本文典研究』，大阪：和泉書院，2002。[Santo Isao, *A Study of Japanese Grammar Books of Early Meiji*, Osaka: Izumi Shoin, 2002.]
- [32] 仁田正義：『ある近代日本文法研究史』，大阪：和泉書院，2005。[Nita Masayoshi,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Grammars*, Osaka: Izumi Shoin, 2005.]

- [33] 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Ge Zhaoguang, *Dwelling Here in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34] 戴克敦:《国文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Dai Kedun,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5.]
- [35]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上海:群益书社,1920 年。[Liu Fu, *An Introduction to Wenfa*, Shanghai: Qunyi Press, 1920.]
- [36]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 年。[Jin Zhaozi, *A Study on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37]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年。[Chen Chengze, *A Brief 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2.]
- [38] 杨树达:《词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Yang Shuda, *A Dictionary of Empty Word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8.]
- [39]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Yang Shuda, *Higher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2007.]
- [40] 石川诚:『國語漢文提要:文檢受驗』,東京:広文堂書店,1918。[Ishikawa Makoto,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Tests in the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okugo Kanbun Teijo: Bunken Jukan)*, Tokyo: Kobundo Shoten, 1918.]
- [41] 佐々木藤之助:『提要文檢漢文科の組織的研究』,東京:启文社書店,1930。[Sasaki Tonosuke,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est in the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kyo: Keibunsha Shoten, 1930.]
- [42] 佐々木藤之助:『文檢参考漢文典』,東京:启文社書店,1937。[Sasaki Tonosuke,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est in the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okyo: Kobundo, 1937.]
- [43] 山口經濟専門学校図書課:『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東亞關係図書目録(和漢書分類之部)』,神戸:山口經濟専門學校,1944。[Yamaguchi College of Economics Library, *Yamaguchi Higher Commercial College Library Catalogue of East Asia Relations (Japanese and Chinese Part)*, Kobe: Yamaguchi College of Economics, 1944.]



邮发代号: 国内 32-35 国外 BM 372

欢迎订阅 2015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刊物,是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新闻出版总署“百强社科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浙江期刊方阵“精优型”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全国最早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学术期刊之一(1997 年 3 月),也是历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要览》(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近年来,在美国 SSCI 及 A&HCI、南大 CSSCI、中国知网、中信所等国内外影响因子指标先后跃居全国所有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第二、全国综合性高校人文社科期刊第一;是唯一进入“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榜单的高校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先后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等 8 个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的 15 个著名索引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双月刊,大 16 开本,200 页,逢单月 10 日出版,全年共 6 期。刊号:ISSN 1008-942X,CN 33-1237/C。2015 年每期定价 68.00 元,全年定价 408.00 元。欢迎向各地邮局订阅。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编: 310028

网址: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电子邮箱: zdxb_w@zju.edu.cn

电话: 0571-88273210、88925616

传真: 0571-88273210